

四十年的追求

禹作敏

一九八八年十月

前 言

我今年59岁了，亲身经历了解放前后农村的历史变迁。社会实践告诉我：过好日子、富日子、舒心日子，是我们农民的理想和愿望。可怎样才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呢？我们大邱庄人，特别是我自己，整整求索、探索、思索了四十年。我的这个回顾所记述的正是我们思富、奔富、致富的历史过程和理性认识。

上 篇

卅年曲折换来的根本觉悟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快四十年了。四十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不算短。可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讲实在不算长。在这不短不长的四十年中，我们大邱庄的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前卅年和后十年，前卅年寻富不能富；后十年求富真致富。一穷一富，一天一地，经纬分明。穷有沉痛教训，富有实在真经。总结教训，是为了避免新的失误，揭示规律意在创造未来。记得有一个伟大人物说过，一个民族从自己的教训中学习，收获更大。为此，我首先以求实的心情，回顾那不愿回忆，又必须回忆的卅年沉重历史。

一、奠定温饱的物质基础

我把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到一九七八年这三十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土改和合作化阶段。时间从四九年到五六年。第二阶段是农村社会建设阶段，时间从五七年到六五年。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阶段，时间从六六年到七六年。

“奠定温饱的物质基础”是讲在土改和合作化阶段中，我们大邱庄人是怎样人心思富、迈步奔富的。

封建社会，农民贫穷有两大根源：一是政治上受地主阶级的压迫，二是经济上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农民手中没有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照样摆脱不了穷困的经济地位。中国共产党最了解农民的愿望，从根本上代表我们亿万农民的利益。一建立政权，便立即组织和带领我们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分田地，实现农民世代代的那种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理想。到一九五〇年，全村279户，1670人，都分得了田地，10520亩土地均有了自己的新主人。我们农民分到土地的那种幸福心情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几辈子无立锥之地的老雇农，甚至跪在分给自己的那块土地上，双手攥着两把土，激动得老泪纵横。人们把获得生产资料的巨大喜悦和对土地的深情化成了精心劳作的力量。无私的土地通过人们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终于填满了常年半饥半饱吃糠咽菜的肚皮。家家户户基本上不挨饿了。这是我们大邱庄历史上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可是不挨饿就算富裕日子吗？而家家户户吃饱饭的成果又能维持多久呢？！果然，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村一些劳力少人口多的户，家中有病人的户，种地不在行的户，碰

上天灾人祸的户，日子难以为继。只好出卖刚获得不久的土地。相反，人强马壮，会种地，善算计的殷实户开始公开地买进土地。穷富分化的苗头出现了。发展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困难户发出了求援的声音。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党又为我们农民指出了合作化的光明道路。五二年上级号召成立互助组。于是互助组在大邱庄陆续出现了。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五四年我们大邱庄出现了八个初级社。到五六年便由土地入股分红的初级社升格为土地集体所有、按劳分配的高级社。和全国一样，合作化的速度是不慢的。合作经济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说实话，她并没有起到象宣传时所说的那种巨大作用。因为合作化的步子迈得太快了。超过了当时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象我们村当时刚刚建立的几个互助组，就有真的，有假的。刚办初级社时出现的那八个初级社，当年就垮了3个。村里甚至还闹过拉马、赶牛、牵驴退社的风潮。当农民想歇歇脚，喘喘气，休养生息一下时，反而催着农民加快脚步朝前跑。农民的反感情绪和抵触心理是可想而知的。这种不符合农民心愿的急躁冒进，又怎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呢！

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国历史上却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从农民求富奔富的角度分析，我们两点认识：首先，经过土改，使耕者有其田，

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初步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是土改的伟大历史功绩。但个体经济终究是脆弱的。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靠个体的小农经济是无法使农民共同走上富裕道路的。其次，虽然在合作化过程中犯了严重的急性病的错误，曾经影响了农村经济的顺利发展。但集体经济的道路是无可非议的。合作化道路是广大农民致富的康庄大道。大邱庄近十年集体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二、头脑发热导致“穷过渡”

前三十年的第二阶段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十年中，教训最深的是五八年出现的“穷过渡”。农村实现合作化以后，我们农民朝哪里走？国家怎么让农民富裕起来？在这极端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道路是利用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而创造的物质基础，扎扎实实地搞社会主义，一心一意地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实现农村工业化、农村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另一条道路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继续搞生产关系的改革。超越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经济现状，企图一步迈进共产主义。前一种道路是使我们农民逐步致富，从贫困到温饱，再奔小康生活的道路。而后一种道路则是使广大农民继续贫困，甚至仍然饿肚子的道路。不幸的是我们选择的恰恰是后一

种脱离富裕、继续贫困的道路。

后一种道路的主要特征就是高举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的三面红旗。那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三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共产风”、“浮夸风”吹遍神州大地，大邱庄也无法避免。当时我们村属于静海县团泊洼大公社。这个公社占了相当于现在十来个乡的面积。公社的地域，东至现在的南郊和大港区；西到淤河；北临现在的西郊区，南界河北省黄华县。地盘不能说不广。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公社力量不能说不大。在大公社内可以随意由公社调配各村的财产和人力。社员吃饭发饭票，在全公社范围内，到各村食堂吃饭不要钱。这不能说不“公”。这“一大二公”，就是当时公社的特征和所谓的优越性。有了“一大二公”，必然产生“一平二调”。这就毫无疑问地平了农民的积极性，调走了农民致富的希望。对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们往往记住的是“鼓足干劲”。为了体现干劲鼓足了。我们村的行动口号是：吃在洼，住在洼，抬着棺材跟在洼。大年三十晚上还在地里挑灯苦战。村里泥土房的墙壁上，还贴着大字标语：“有雨小干，无雨大干，没风没雨拼命干。月亮底下当白天”。还写着什么：“少年学罗成，青

年赵子龙，老年赛黄忠，妇女超过穆桂英。”这一来，鼓足干劲成了鼓足虚劲。助长了浮夸风，造假风。一次上级搞扫盲运动，村里便把社员召集在一起，保证每人识一个字。一夜之间便向上级汇报说，扫盲已经胜利结束，全村没有文盲了。大炼钢铁，社员家的好锅好勺，队里的犁铧也都搬来砸成废铁，投进用砖砌成的土炉里，用柴火和煤去熔炼。结果扒出来是废钢铁和焦碳纠缠在一起的铁砣子。给上级报的却是炼出了多少吨好钢铁。对“多、快、好、省”，当时只记住了“多快”，忘了“好省”，结果成了“少、慢、差、费”。譬如，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多种水稻，便不惜把长了半人高的玉米和高粱毁掉。结果，秋季一无所获。为图快，在撒稻种时，一小车三麻袋稻种，两个人一袋烟功夫、就撒播完毕。实际哪里是撒，纯粹是把种子倾倒在水田里。这种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给生产造成了人为的大灾害。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大灾难。建设社会主义，成了名符其实的败坏社会主义。本来，我们村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三年时间，风调雨顺。可是由于升虚火，鼓虚劲，夸海口，干傻事，结果引来了灾祸。风调雨顺，地里却不打粮。种田的人没饭吃。那时，一个人一天才发几两粮食。最少时不足四两。只好实行瓜菜代。要不是人们当时留了个心眼，多种了一些胡萝卜，不

然，不知多少人要到阴曹地府去报到呢！

头脑发热的穷过渡，给我们的教训是终生难忘的：首先是任何时候都要把着眼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决不能一味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不然，发展不了生产力，提高不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倒瓦解了农村的生产力，给群众带来灾难。其次，绝不能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谬思想和举动，助长高指标，瞎努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泛滥。五八年以后出现的这种以穷过渡为特点的“左”倾错误，其结果使亿万农民遭殃，还谈得上怎样过好日子呢！

三、“恐资症”造成了“批富风”

前三十年的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阶段。

“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使我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大邱庄老百姓在此期间不得不为温饱而发愁。为什么整整十年，生产得不到发展，农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呢？这是因为“恐资症”造成了“批富风”把富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穷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穷则革命，富则修。穷则光荣，富则可耻。穷是歌颂的对象，富成了批判的对象。既然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理所当然地就要批判一切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方针政策了。在“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中，农村批富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批富从理论上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应当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批判“唯生产力论”，恰恰是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这就等于搬掉了唯物史观的基石。使人们误认为搞生产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颠倒黑白，把真理说成谬误的做法，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其次，批富从组织上打击了哪些发展生产的带头人。现在看，当时，“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整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带头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功绩，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行。把一大批发展生产力的带头人，整下台、赶进牛棚，下放到“五七”干校，实行强制劳动。工农业生产怎么不受损失！人们怎能不产生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呢？这又怎能不大伤我国农村经济的元气！

此外，批富从实践上堵住了农村致富的门路。农村如果单打一的种粮食无论如何是富不起来的。可是当时强调“以粮为纲”，片面追求粮食的数量，大力推广连大牲畜都不愿吃的杂交高粱。堵塞一切进钱

的渠道。凡是和钱沾边的统统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在种植业上，所有值钱但产量低的作物都不让种。种谷子除了可收小米外，谷草每斤还可以卖一毛钱。但因为亩产低，上边不叫种。种了也给强行毁掉。红小豆可以出口，村里人用一斤红小豆可以换一斤半面粉，还能得点差价。因为红小豆亩产低，公社明令禁止种植。偷偷种了，被发现后，不光要毁掉，还得挨批判。在付业上，除了号召大养其猪外，凡是进钱的项目都不允许搞。一九七一年，我看群众每天就是玉米饼子，咸菜头，买个油盐酱醋，给孩子扯个花布的钱都发愁，生活太清苦了。于是，我们就和外贸部门联系，组织群众用麻绊草编草垫子，交给外贸部门出口。大家换个零花钱。这样，外贸部门满意，我们也高兴。这种草处处有。这种活家家都会干。于是全村形成了编草垫子的热潮。草垫成品每集（五天）上交一回。每回一户都能弄个五元、八元、十元的。这一来，家家都尝到了富的滋味，人人都有了笑模样。手头活泛了，不光打油买醋不用发愁了，还能给孩子扯布做身新衣裳。小伙子们也头一回穿上了绒衣绒裤。有的人家还买了自行车、马蹄表。可是好景不长。县里知道后，派了一个县委常委到我们村蹲点。逐个地和大队干部谈话，逼着大队干部做了检查。并且下令停止草编活动。我们干部想不通的是，明明六十条上

允许做的事，为什么不叫干呢？编个草垫子，赚个零花钱，怎么会成了资本主义？！总说钱不是好东西，可没有钱，怎么过日子！正正经经挣来的钱，怎么和资本主义的剥削相提并论呢！不光是这个，连从地里拔点草，也和资本主义挂上了钩。上边让村治保主任在路边设卡子，抓往家里带草的人。谁被抓住，当晚开批判会，他就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还说这是堵资本主义的路，不然，“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为了批富，一从理论上搞乱，二从组织上整倒，三从门路上堵死。这就绝了我们农民致富的希望。我们农民还何去何从呢？当时，“四人帮”号召学习小新庄。县里带着我去了三次。我想，唱歌朗诵，蹦蹦跳跳能让地里长出粮食吗？所以，回村后，我按兵不动。县里工作组看我没动静，急了。工作组的一个成员就写了一首小诗，署上我的名字，在大队广播了。这一来，青年人误认为我带头学习小新庄了。全村忽拉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三个月时间，1200整半劳动力，产生了860名演员队伍。儿童跳，青年唱，妇女演。老头老太太也登上舞台耍。谁能上台演节目，就给谁记十分工。此情此景，谁还有心思促生产啊！全村当年就减产80万斤粮食。这就是跳出了减产，唱出贫穷，演出了实实在在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教训，不值得我们永远思索吗！

四、历经磨难唤起的醒悟

回顾历史，温故知新。我思想形成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观念：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克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倾病”。只有根治这种顽症，农民才有希望彻底摆脱贫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倾病”，花样翻新，种类繁多，归纳起来，在农村不外乎这么八种：

第一种，也是危害最大的一种是“穷光荣”

在旧社会 穷是阶级压迫造成的。农民穷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穷，农民才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农民仍然穷，难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光彩吗？可是极左思想却认为：富可耻，穷光荣。这就是把荣辱观根本颠倒了。受穷光荣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也是对亿万农民的愚弄。

第二种是“左有功”。

极左革命，左倾有功。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最时髦的思潮。左倾思想在社会发展上是超越阶段的冒险主义，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办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办的事情。左倾思想在对待人际关系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把阶级斗争引进党内来，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上则乱扣帽子，乱打棍

子，乱抓辫子。那些出身不好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人，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成了批判和打击的对象。结果，整得人人自危，内心恐慌，六神无主，谁还有心搞生产呢？

第三种是“假得利”。

左倾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是说假话办假事的人反而得到实利。结果，败坏了党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到头来，不仅害国害民，也害了自己。这种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恶劣作风不纠正，党和人民就会继续遭殃。

第四种是“风得势”。

左倾思想的第四种表现是风派得势。刮东风，他是东风派；刮西风，他是西风派。热风来了他象热锅上的蚂蚁；冷风来了他象冻僵的泥鳅。唯上 唯书 唯风，就是不唯实。而那些脚踏实地干事业、搞生产而不随风倒，不跟风跑的干部，春天是红人，夏、秋是忙人，一到冬天搞运动时，就成了受批判的罪人。

第五种是“齐得誉”。

“齐”就是工作上的“一刀齐”。这是左倾思想的又一种表现，搞生产，干事业，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按照上级指示套，按着一个模子扣，用一把刀来切，哪个村，哪块地种什么，村里农民最清楚。可是却作不了主。一个县只有一个生产队长，那就是县长。

不管村情地情人情，一个指示一道令，让种什么都种什么。数字一统计，县长得了虚名，群众落了实祸。这种一刀切、一刀齐的办法是最省劲，但也是最坏事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是“‘大’害人”。

左倾思想的又一种表现是“大”的观念。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大批促大干”、“大打大战”等等。这种口号激发地是盲目蛮干的精神，鼓励地是不切实际的假、大、空作风。结果，“跃进”成为“跃退”，“大革命”成为“大灾难”。大干快上这种盲动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搞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人。

第七种是“‘公’坑人”。

这个“公”是指冒充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群众觉悟普遍达不到少数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水平时，一味地强调公有观念，只能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腐蚀人民的灵魂。到头来，公有观念变成了平均主义思想。使人民得到共同贫穷的苦果。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九五八年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沉痛教训。

第八种是“怕风险”。

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们整怕了，批怵了。

由于实际上是出头的椽子先烂，人们都不愿意冒尖抢先了。普遍存在着左顾右盼，前等后靠的思想。认为等安全、闯危险。这种怕风险的心理，把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都磨掉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社会里，这种怕风险的精神状态才是发展事业的真正危险。

总之，三十年的左倾病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贫穷。结果，左了穷，穷了左，越左越穷，越穷越左，形成了恶性循环。我们再也不能给左倾思想保留半点市场了。这是十亿人民以三十年的血汗为代价，换来的历史结论！

下 篇

十年巨变揭示的必由之路

风风雨雨三十年，总算过去了。当历史翻到一九七八年这一页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个会议为我们农民指明了致富的方向，打开了致富的大门，带来了致富的希望。我们大邱庄从此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穷有教训，富有经验。我们这十年是怎样走富裕之路的呢？概括起来，是四句话：思想解放敢唯实，坚持改革为致富。工业革命显神通，迎接挑战再进步。

一、思想解放敢唯实

我们国家和民族，我们农民群众，吃够了唯上唯书唯风的苦头。按理说，唯实该不成问题了吧！可是，真要唯实，那才困难呢！我理解，唯实，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解放不解放，要以敢不敢、能不能思想唯实来衡量。思想唯实了，才能吹散罩在富裕问题上的迷雾，敢于求富，善于奔富。

要致富，就该给金钱恢复名誉。敢不敢为金钱正名，是能不能唯实的一块试金石。二千多年来，人们